

社会观察

# “游戏机禁令”何以名存实亡 13年

文/何勇海

传闻了多年的游戏机禁令解除的消息，终于在日前得到了证实——1月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，在上海自贸区内，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，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。这意味着中国从2000年开始的游戏禁令基本得到解除。

(1月8日《北京青年报》《新快报》)

闻此消息，我立马生出一个疑问：原来国内生产和销售游戏机是有禁令的，可现实当中游戏机为何从未绝迹呢？在该新闻之后的跟贴中，一些自诩“资深玩家”的网友也纷纷表示，“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一纸禁令的存在”，“从小到大一直玩游戏机，就没停过”。看来，游戏机禁令恐怕是名存实亡了13年。

那么13年前，游戏机禁令缘

何出台？有关部门当时的理由是：担心游戏暴力对青少年产生有害影响，以及防止游戏上瘾。因此在《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》中规定：“任何企业、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、附件的生产、销售活动。”

然而禁令似乎只管住了游戏机从正规渠道面向国内生产和销售，地下状态的面向国内生产销售游戏机的势头，反而迅猛发展。比如上述新闻就报道，北京中关村某电子商城地下二层，时至今日仍聚集着数十家游戏机店铺，是北京最为知名的水货游戏机市场。大多数是从香港走私来的水货，还有一部分是从各大游戏厂商设在中国的代工厂里流出。人们购买游戏机并没有障碍。

既然游戏机禁令针对“任何企业、个人”，为何却对水货游戏机市场视而不见，或“睁只眼闭只眼”？

这种“选择性监管”，导致游戏机13年来并未远离国内游戏玩家，游戏机禁令也就没有起到保护青少年的作用。这恐怕也是此番解除游戏机禁令的原因之一。这事件充分说明，行业监管不应区别灰色地带与阳光地带，依法行政不能只停留在颁布禁令上，更需要严格执行禁令的决心和力度。

随着游戏机面向国内生产与销售解禁，相信会有很多人变身“电玩党”，同影迷、网虫等一样成为社会寻常群体。原来担心游戏机让青少年沉迷，以及受到暴力色情内容的伤害，现在更需要警惕，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强化制度设计，加强管理引导，培育健康环境。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外国的游戏分级制度，什么样的游戏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。如果有明确规定，可能更好管理，也更能把危害降低到最小。

漫画漫话



## 大妈再出手

文/小强图/春鸣

1月5日下午，常州市天宁区新城金郡一位业主散步时，偶然发现广场舞大妈为占地跳广场舞竟将停在小区商铺门前的车子，贴上了告示——“为了大家的健康，请您在18:30-20:30这段时间不要在此停车。车如果有意外，后果自负！”

(1月7日《现代快报》)

若干年来，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及其欢快响亮的节奏遍布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与之相伴的，是所在小区男女的怨怒，有人对大妈们恶毒地放藏粪、开枪、泼粪，面对打压，有些大妈立场开始出现动摇，打起了退堂鼓，而本则新闻中的大妈却如红梅斗雪，傲骨临风，不但不退缩，还再度逆袭，抢地盘，贴告示，发恐吓……年轻的白领睹此，又发出了“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”之问。若老年人的生活能更丰富一点，大妈们的激情是否就会不只投射到广场舞？医治某些大妈的广场舞痴迷症，功夫或许在广场舞之外。

# 快递实名制就怕隐私“走光”

文/张永琪

国家邮政局方面表示，2014年将首先在北京、广东、西藏、云南、新疆等省市区推行寄递服务实名制，寄件人必须提供真实地址、姓名，并提供相关身份证明，并逐渐在全国实现常态化。

(1月7日《京华时报》)

汽车撞到墙知道要拐了，鼻涕流到嘴里知道要甩了。毒快递致人伤亡事件的发生，暴露出快递业管理上的漏洞，民众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。现在，国家邮政局将在部分地区推行寄递服务实名制，这种痛定思痛，来得实在太迟了。

推行快递实名制，这对顾客是一种新的要求，需要得到顾客的理解和配合。如果宣传工作到位，快递企业服务水平能够同步跟进，顾客没有后顾之忧，一般顾客会予以配合的。反之，快递企业以安全为名，不保护顾客的隐私，推行快递实名制就难以顺风顺水。

推行快递实名制，要求寄件人

必须提供真实地址、姓名、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，快递企业轻而易举就可掌握寄件人的隐私或信息资料。如果快递企业管理出现漏洞，顾客的隐私或信息资料就很容易流失，以致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快递企业内部有人心术不正，出售或利用顾客的隐私资料生财，那么对顾客的危害性就更大，这样的快递实名制，就会成为“损民制”、“失民

制”，让顾客付出代价。

推行快递实名制责人也要责己，不能只有对顾客提出的必须要求，更要有对自己提出的必须要求。比如，快递企业需要向顾客做出承诺，会保护好顾客隐私，决不让顾客提供的真实地址、姓名、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泄密。如果发生泄密事件，不仅要承担精神和经济损失，而且还要承担法律责任，不让顾客作出无谓牺牲。



教育评弹

# “吊发苦读”备考不值得提倡

文/黄春景

古有“悬梁刺股”，今有“衣架吊发”，近日，各地大学都进入了“期末考试时间”。1月7日，福建农林大学一名大二女生“吊发苦读”的照片在微博上热传，网友感叹“学霸的世界，我们不懂”。

(1月8日东南网)

古人用“悬梁刺股”来激励自己奋发图强，换到现代社会，如果有人模仿这种做法，单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，可以理解，但“吊发苦读”这办法并不值得提倡。

近年来，从“吊瓶考试”到“赤膊上阵”再到如今的“吊发苦读”，虽然宣扬的是一种拼搏精神，但方法无疑是欠妥的。“吊瓶班”被人喻为现代版“头悬梁”。最为突出的是，湖北孝感一中高三(3)班学生集体在教室挂吊瓶，一度被调侃为“史上最牛‘吊瓶班’”。高考结束后，

该学校达到一本线者222人，达到二本线及以上者659人。遗憾的是，“吊瓶班”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中，无一人达到一本线。这说明了考前在心理上放松，从容应考是多么的重要。不论是“吊瓶考试”、“赤膊上阵”还是“吊发苦读”，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。

首先，“吊发苦读”的另类减压方式，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，营造出更加紧张的氛围。因为这在不少学生看来，复习功课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引起过分的紧张和焦虑，反而是不利于减压的。特别是进入了“期末考试时间”的冲刺阶段，不宜过分强调考试的重要性，而应当保持与平时一样的心态和行为；第二，“吊发苦读”的减压方式会使学生产生一种相对病态的竞争心理，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。为了考试什么怪招、奇招都敢

想，都敢做，那学生以后，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，在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下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“吊发苦读”的压力之大，一旦发酵为公共舆情事件，难免在心理上给其他学生在无形中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。

“吊发苦读”，为了考试出成绩而“吊发”，背后是极端的考试功利化。什么样的考试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，“吊发苦读”这根考试指挥棒，指向的是“急功近利”分数观，这与当下倡导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。我们知道，自我减压的方式很多种，学生应遵从温和、舒缓、轻松的原则，淡化考试的功利色彩，以适当的减压方式，树立良好的竞争心态。对于“吊发苦读”这种现象，不能止于自娱自乐的围观，必须分析造成这一怪象的深层次原因，想办法加以解决，别再让学生因为“功利”的考试导致备考“走火入魔”。

一针见血

## 女博士当酒店试睡员 何必满城风雨

文/李想

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的张欣妍成为了一名酒店试睡员。张欣妍是天津南开大学一名“90后”在读女博士，天资聪明的她在学院刚刚推出“直博”政策那年，被导师推荐不用读硕士，直接读了博士。她觉得酒店体验师，也就是所谓“试睡员”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。

(1月7日新华网)

女博士当试睡员在网上引发热议，这很正常，因为此事件包含两个舆论热点，一个是女博士，一个是试睡员，其中一个发生点什么事情都够网友们在网上吐槽半天，更别谈二者结合在一起了。

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，新兴工种层出不穷，“试睡员”是近几年兴起且被网友艳羡的职业。这个曾被网友评为“史上最爽职业”的“试睡员”在国外被称为“酒店品评师”，要求应聘者具有敏锐观察力与感受力，热爱旅游，乐于分享所见所闻。

试睡员职业本无可非议，但是这个职业一旦和女博士联系在一起，种种疑问就出来了。女博士真的适合这份职业吗？恐怕未必。应聘要求上的那什么观察力、感受力，热爱旅游等好像不是博士的专长，似乎跟很多人的能力素质和兴趣爱好无异，与学历没有太大关系。于是，很多自以为比较有深度的网友就开始冒泡了，马上就此事事件盲目拔高，比如开始分析就业形势、攻击教育体制、抨击招聘单位等等，反正这是他们所认为的对社会的深刻剖析，能起到治病救人的功效。

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，往往是被接受者和评论者弄复杂了。我觉得，此事件不涉及什么教育机制、社会就业等深层次问题，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的一次职业选择而已，这种选择没有那么多其他因素，就是对新兴职业的向往，渴望去体验和很多人不一样的人生经历。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博士女孩子的未来发展，相信学历这么高的女孩子智商不会低到哪里去，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会有一个构思，也知道试睡员并非自己专长，不能使二十年所学专业有所用，试睡员也未必就是她一辈子的职业。因此，即便是选择了试睡员又有何妨呢？又不是签订了终身合同。一个高校毕业生的首次职业选择大多不会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所以，对女博士当试睡员，大伙不要太在意，这不是普遍社会现象，没必要闹得满城风雨，也不需要“有识之士”去剖析、去诊断，怀着看了就“洗洗睡吧”的平常心看待会比较好。